

#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说”的学说史考察与当代转换

林 金 忠

(厦门大学 经济研究所,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趋势的某些论述, 后来逐渐被归结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并最终被形式化, 成为数十年不变地被写进教科书的| 个既定命题。“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说”所依据的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趋势的推演存在逻辑漏洞。这| 命题在方法论层面上忽视了社会历史发展的矛盾运动中的中介作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消亡并非源于所谓“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说”, 而是源于这种生产方式本质上是与人类生存环境内在对立的, 而这种对立也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和不可持续性, 它必然消亡。

**关键词:**资本主义; 基本矛盾; 生产方式; 马克思《资本论》

**中图分类号:** F03 F09 F1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 462X( 2011) 01- 0141- 05

## 一、马克思的有关论述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1 卷第 24 章最后一节“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中概括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趋势, 他写道: “一旦劳动者转化为无产者, 他们的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 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脚跟, 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 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为社会使用的即公共的生产资料, 从而对私有者的进一步剥夺, 就会采取新的形式。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 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 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 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sup>[1] 831- 832</sup> 从这段引述可见, 在马克思看来,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终灭亡是这样一种两极对立的矛盾日益尖锐化的结局, 即一方面是生产活动的日益社会化, 另一方面是

资本的日益集中以及少数人对生产条件的垄断。他并没有把这一矛盾称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但他认为这一矛盾的日益尖锐化将达到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外壳”所无法容纳的地步, 于是将导致这个生产方式的必然灭亡。

问题在于: 资本日益集中与生产日益社会化之间为什么就一定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和日益尖锐化的矛盾对立, 并且一定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灭亡呢? 理解这个问题, 就需要回到《资本论》第 1 卷第 7 篇“资本的积累过程”的整体叙述逻辑。第 7 篇共计 5 章, 其叙述逻辑可谓环环相扣, 本文上述引文所在的第 24 章则是基于第 23 章, 从纵向历史的视角, 由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逻辑地推导出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 进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灭亡预言。<sup>①</sup> 据此分析, 我们可以从第 23 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中找到答案的线索。在这一章中, 马克思是按照这样的逻辑链条来推演的: 资本的增大 (包括资本集中和积聚) 以及由此引起的资本日益集中到少数人, 在资本家追逐剩余价值的内在动力与外部市场的竞争压力双重驱动之下, 导致了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 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 导致了相对过剩人口及产业后备军的形成; 相对过剩人口及产业后备军的常态存在, 则导致了无产阶级的贫困化 (包括相对的和绝对的贫困化); 无产阶级的贫困化必然引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加深, 前者就会起来革命以暴力推翻后者。第 24 章预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 正是在这样的逻辑推演下得出的结论。

① 从第 1 卷第 7 篇的整体叙述逻辑来看, 该篇的最后一章即第 25 章“现代殖民理论”应属于补充说明性质的章节 (可以视之为一个附录或一个补充说明性质的章节)。

收稿日期: 2010- 09- 30

作者简介: 林金忠 (1962- ), 男, 福建福州人,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从事经济组织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研究。

倘若我们对这种逻辑推演加以仔细推敲,就会注意到这样一点,即关于“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的逻辑推演可能存在漏洞。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推导出相对过剩人口,逻辑上并不具备充分条件;马克思之所以如此推演,主要是由于他未能也无法预见到资本主义产业结构变动的长期历史趋势,即第三产业的发展有可能吸纳了由第一和第二产业挤出的相对过剩劳动力。笔者认为,出现这一逻辑漏洞,客观上也并非马克思之过失,其根源可归结于客观历史条件所限。下面就此展开进一步阐述。

由于任何逻辑演绎终究都无法完全摆脱可观察到的经验事实,这就使得任何伟大思想家都会受到他所处时代的局限。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剖析,主要基于他对19世纪上半叶之前的资本主义现实的经验考察,因而他的思想同样也难免要受到他所处特定时代的限制。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工业革命在英国历经了一个世纪,尚且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在西欧大陆诸国要么仍是方兴未艾,要么只是初露端倪;受限于时代,马克思固然可以凭借着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及其演进逻辑的理论把握,用以推测这种生产方式的历史过渡性,但无论如何他也无法系统地把握历史趋势的所有具体特征,比如不可能预见到一个世纪之后的当代资本主义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后产业结构变动的长期历史趋势。实际情况是,在马克思所研究的历史跨度之内,第三产业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仍是十分不发达的。在19世纪上半叶,工人阶级所从事的第三产业,除了传统商业及并不发达的金融业之外,新兴服务业主要还只是家政服务,马克思当时把它叫家庭仆役。马克思已注意到了家庭仆役的大量存在,但从他的叙述中不难看出,实际上他并没有、也不可能把握家庭仆役大量存在这一现象的本质,未能认识到这是反映资本主义产业结构变动的长期历史趋势的一个早期前兆。

应该说,这种认识上的时代局限性,在同时代的其他思想者中也是普遍存在的,后来的历史学家们所提供的证据也证实了这一点。比如,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曾关注下面历史事实:在19世纪初,仅仆人就占去伦敦总人口的15%;在1851年前后,英国的仆人总人数已超过了100万人<sup>[2] 655 695</sup>。家庭仆役作为一种较低层次的服务性行当,往往仍披着一层没落旧时代奴仆关系的面纱,因而其经济意义在当时并不被经济学家们和历史学家们所关注,所以他们也就不易从中觉察到第三产业在工业化过程中对于吸纳从第一和第二产业中被排挤出来的剩余劳动力的

重要作用,更难以洞察到这种吸纳作用所蕴涵的产业结构长期历史变动趋势。

其实,人的认识受时代所限,此乃合乎情理之事,并不能简单地怪罪思想者。黑格尔当年谈哲学认识时曾说过:“哲学作为有关世界的思想,要直到现实结束其形成过程并完成其自身之后才会出现。……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sup>[3]</sup>马克思自己也曾说过:“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sup>[1] 92</sup>这些说法,都是合乎唯物史观的基本命题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如果我们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着其自身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过程,就不应该苛求马克思在这一历史过程尚未充分展开之前就能准确预言到长远将来的发展趋势。然而问题在于,在马克思之后,其继承者却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趋势的论述,以及关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的预言,归结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 二、恩格斯的阐发及随后的形式化

恩格斯在其晚年著作《反杜林论》中接过马克思的上述思想,同时也依照他自己的理解加以大幅度的发挥和进一步的引申。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是:一方面,生产资料的高度集中和协作生产下的生产社会化,即大批工人在生产劳动过程中事实上共同使用生产资料;而另一方面,这些日益集中的大规模的生产资料却依旧归资本家私人占有。于是,导致了使用生产资料进行劳动的劳动者不能成为自己生产的产品的所有者,也就是说,资本家凭借着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而占有了劳动产品,亦即对劳动者进行经济剥削。恩格斯认为,这两个方面构成了一个矛盾,亦即他所说的“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sup>[4] 268</sup>。从这个方面,他得出的结论是:资本主义必然无法摆脱经济危机和阶级对抗,最终将导致暴力革命和整个生产方式的覆灭。

恩格斯的另一个结论是,从“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地构建出未来社会的所有制图景。这一幅图景的核心内容,即是将资本家私人占有转变为社会直接占有。在恩格斯看来,实现这种转变的途径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由革命中产生的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将资本家占有的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他同时又强调说,国家占有仅仅是个手段,而不是目的,因为国家终究是要消亡的。他说,“生产力的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但是它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

式上的手段, 解决冲突的线索”<sup>[4] 275</sup>。“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 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sup>[4] 277</sup>。当国家“使自己成为多余的”时候, 国家所占有的财产也就变成了社会直接占有的财产。恩格斯用“直接社会化”、“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地占有”、“社会直接占有”等用语<sup>[4] 304 276</sup>, 强调国家消亡之后社会对生产资料的直接占有。

在恩格斯之后, 列宁又作了更进一步的发挥。在《帝国主义论》中, 列宁继承了恩格斯关于“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的思想, 他写道: “资本主义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 就使生产紧紧接近最全面的社会化……生产社会化了, 但占有仍然是私人的。社会化了的生产资料仍旧是少数人的私有财产。表面上大家公认的自由竞争的一般架子依然存在, 但是少数垄断者对其余居民的压迫更加百倍地沉重、显著和令人难以忍受了。”同时, 他还阐述了这个矛盾在帝国主义阶段(或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是如何得以深化和激化的, 提出了帝国主义的五大基本特征, 并且断言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 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sup>[5] 748 843 737</sup>。

在列宁之后, 后继者们又基于恩格斯和列宁再次作了更进一步的形式化的发挥, 终于形成了若干“标准化”或“定格”的叙述, 这包括: 首先, 把“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规定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并把这个基本矛盾视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最主要的理论依据。其次, 从恩格斯论断又作了更进一步的归纳, 主要包括: (1) 从恩格斯所说的无产阶级国家剥夺资本家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 引申出现实中的国家所有制的合理性。如果说恩格斯的“社会所有制”的落脚点是“社会直接占有”, 那么后继者们则只是抓住了国家占有这个环节, 并将国家所有制定性为全民所有制, 如此, 国家所有制似乎也就获得了存在的合理性了。(2) 从恩格斯所说的“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 引申出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下全体人民的利益一致。斯大林甚至说社会主义社会已经不存在社会矛盾, 当然也就不会发生诸如经济危机之类的现象了。(3) 从恩格斯所说的“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 引申出社会主义生产的有计划按比例“规律”, 苏联甚至使之体系化、制度化和政治意识形态化, 据此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并把这种体制视为社会主义正统模式。

数十年后, 在苏联和我国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 基本上都沿用了业已“定格”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说”, 其标准的表述是这样的: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 这个矛盾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 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 第二, 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 第三, 由上述两个矛盾而导致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立。

### 三、回到马克思的一贯思想和基本方法

上文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说”所作的学说史考察表明, 且不说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的逻辑推演因时代所限而客观存在着逻辑漏洞, 据此而导出所谓“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说”也未必符合马克思的一贯思想和基本方法。倘若我们回到马克思的一贯思想和基本方法, 那么, 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说”就会有不同的认识。

所谓马克思的一贯思想, 所指的就是唯物史观。这是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性认识的独特思想, 最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奠定其基本框架, 而后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得到了经典概括, 并贯穿于马克思思想发展之前后期, 因而可以理解为马克思的一贯思想。唯物史观的独特和伟大, 在于它在思想史上第一次揭示了人类历史演变进程的客观规律性, 因而也就首次使得历史研究成为一门科学。

唯物史观基本原理认为, 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的最终决定力量乃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因此之故, “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sup>[1] 12</sup>。在马克思那里, 这种自然历史过程被归结为一种通过中介的矛盾运动, 即通过生产方式这一中介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生产方式乃是一个中介性范畴, 它联结了生产力范畴和生产关系范畴, 使得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二者之间彼此互动的矛盾运动有了一个平台。在每一种社会形态中, 其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和灭亡过程, 都可以通过具体考察这种矛盾运动以揭示其特定的自然历史过程的演进轨迹及其规律性。其实, 整部《资本论》都是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视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 而马克思把自己所揭示的这个过程的规律称为“自然规律”, 亦即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他说: “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sup>[1] 11</sup>

然而, 唯物史观后来被简约化和形式化为关

于历史发展的二元对立式的矛盾运动,一切都被归结为“决定与被决定”及“作用与反作用”,使马克思的独特伟大思想退化为高度简单化的“历史决定论”,这是对马克思基本方法的简单化。

所谓马克思的基本方法,所指的就是辩证法。众所周知,辩证法强调事物变化发展的内在矛盾分析,但许多人深受二元对立式的矛盾观的影响,似乎忘却了至关重要的一点,即辩证法所说的矛盾乃是借助中介的“螺旋式上升”的运动,而非撇开中介的简单二元对立式的直线运动。倘若我们回到马克思的一贯思想和基本方法,就不难看到马克思本人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时,实际上处处都很重视中介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作用。他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演变的历史过程视为由一种矛盾形式转化为另一种更高级的矛盾形式(即“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过程,而这种转化本身就是通过必要的中介运动来实现的。换言之,他并没有把这种矛盾运动视为简单的二元式的两极对立。譬如,在论述商品所包含的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矛盾,以及这一矛盾如何推动商品形态和价值形式的发展时,马克思写了一段富有方法论启示意义的话:“我们看到,商品的交换过程包含着矛盾的和互相排斥的关系。商品的发展并没有扬弃这些矛盾,而是创造这些矛盾能在其中运动的形式。一般说来,这就是解决实际矛盾的方法。例如,一个物体不断落向另一个物体而又不断离开这个物体,这是一个矛盾。椭圆便是这个矛盾借以实现和解决的运动形式之一。”<sup>[1]</sup><sup>122</sup>这段话所体现的正是马克思的基本方法——辩证法:事物发展的矛盾运动并非直线运动或简单的两极对立,而是通过中介从一种矛盾形式向另一种矛盾形式的转化发展。商品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运动造就了价值形式的发展,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转化了商品交换的矛盾运动,把物物交换下的矛盾形式发展为以货币为媒介的新的矛盾形式。这种新的矛盾形式并没消除矛盾,而是在更高层次上展示新的矛盾,实际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正是在这种借助中介而转化的矛盾运动中得以发展的。

又譬如,也正是运用这种辩证思维方法,马克思在谈到股份制的性质及其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意义时写道:“在股份制度内,已经存在着社会生产资料借以表现为个人财产的旧形式的对立面;但是,这种向股份形式的转化本身,还是局限在资本主义界限之内;因此,这种转化并没有克服财富作为社会财富的性质和作为私人财富的性质之间的对立,而是在新的形态上发展了这种对立。”<sup>[6]</sup>这段话更为清楚地表明,依照马克思的辩

证思维方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包含的矛盾也并非简单的两极对立,而是通过中介使矛盾本身不断得以转化和发展的一个自然历史过程。

倘若我们遵循着马克思的上述一贯思想和基本方法,那么,“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也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而应该理解为通过某种中介形式而得以不断转化的矛盾运动。这种矛盾运动的中介形式,也就是生产方式的实现形式,主要体现于生产组织形式以及与此内在相关的产权制度形式。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给定一种特定的生产方式,其实现形式可以是多样的,体现在生产组织形式和产权制度形式所具有的灵活性、能动性和一定范围内的可选择性。“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正是通过这些中介形式而使得矛盾运动得以转化,从而不断地获得新的发展形式。据此,简单地从“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就直接地推导出阶级对立、暴力革命乃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覆灭,不仅不符合客观历史进程的实际情况,而且也不符合马克思的一贯思想和基本方法。

#### 四、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分析的当代转换

针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说”,上一节所述绝对不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可以在矛盾运动中永远也不会走向消亡。依照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并不存在任何一种永恒不灭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因此,资本主义的“丧钟”最终还是要“响”的。对我们有意义的问题在于:资本主义的“丧钟”将会如何或以何种方式“响”起来。

对此,笔者的看法是:在针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说”的批判性分析的基础之上,可以通过结合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实际情况,将这一论题加以科学转换(我称此为“当代转换”)。依此,同样遵循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一种生产方式的消亡,其根源在于这种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言,这种内在矛盾并不能归结为所谓“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亦即本文所剖析的所谓“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说”,而是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上与人类生存环境之间的内在对立,这种内在对立根本上决定了这种生产方式的不可持续性。为了阐明此观点,就必须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说起。

一般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是与资本的牟利性质联系在一起的,亦即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目的是为了攫取剩余价值。这一点似已成定论。但笔者认为,只是简单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牟利性质,并不足以道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规定性的全部内涵。更为重要的还在于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下牟利的独有方式,即这种牟利乃是通过市场经济的方式来实现的,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内在结合的。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以及它与人类生存环境之间的内在对立,从而引出这种生产方式的不可持续性,乃是至关重要的。

首先,通过市场经济方式来实现牟利,意味着市场扩张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冲动。从地域市场到国内统一市场再到世界市场,市场的扩张乃至全球化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发展进程。这个过程意味着生产和消费行为的地域性特征被彻底打破,消费欲望被不加限制地激发出来了。“资产阶级既然榨取全世界的市场,这就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已经消逝,现在代之而起的已经是各民族各方面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相互依赖了。”<sup>[7] 469-470</sup>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无休止的市场扩张打破了生产和消费行为的地域性特征,消费欲望伴随着市场扩张而被无限制地“创造”出来,因而也就随之打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

其次,通过市场经济方式来实现牟利,意味着市场竞争。而源于竞争,作为工具理性的科技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一方面,这驱使着社会化生产及科学技术的长足进步,结果是带来了物质生产力的空前的跳跃式发展,造就了越来越丰富多彩的物质文明世界。马、恩当年曾洞察到了这一点,并用颇具诗化的语言加以描述:“资产阶级争得自己的阶级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和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往返,大陆一洲一洲的垦殖,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底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试问在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竟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面呢?”<sup>[7] 471</sup>然而,另一方面,以牟利为目的的物质生产力的奇迹般发展,必然地导致对自然资源的无休止掠夺和对生态环境的极大破坏。仅仅作为工具理性的科技,一旦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牟利性质相结合,一旦与牟利中的竞争相结合,就必然意味着在人类创造出惊人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人类生存的地球环境(乃至外太空环境)却正在加速恶化,而且在多数情形下这种恶化乃是不可逆转的。

再次,通过市场经济方式来实现牟利,市场竞争也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自我强制推广的内在特性。也就是说,起先只是少数国家采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这些国家在全球范围内不

择手段攫取财富,实际上强制地将其他国家也拉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来,于是,最终必然是全球性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形成。这种自我强制推广的内在特性,早先是采取了殖民扩张的形式,当代则采取了所谓全球化的形式。无论采取何种形式,总是能使得那些原本处于前资本主义状态的落后民族,或迫于“船坚炮利”,或为了避免“亡国灭种”,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我们更应该注意到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种内在的全球性和世界性,致使单纯的市场竞争被扩展到了极端境地。人与人之间经济竞争被扩展到人类群体之间的政治争斗(往往以“民主”、“自由”的面目出现),一国内部的群体竞争被扩展到了跨越国界的国际争斗,而在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全球政治框架之下,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必然地意味着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乃至仇恨,因而诸如战争和不顾人类整体利益的算计、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等,就变得不可避免和难以克服了。于是,地球上人类社会自身生存的环境也就随之彻底恶化了,真正形成了一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恶劣的人化环境。我们今日所见之世界,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世界范围内自我强制推广这一内在特性的产物。

上述分析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上与人类生存环境之间是内在对立的,而这种内在对立也必然地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写在墙上的咒语”。这种生产方式发展的极限,必然意味着人类的末日。因此,如果说资本主义的“丧钟”终究是要“响”的,那么,它将以人类生存的地球环境的彻底丧失和人类末日的来临这样一种方式“响”起来的。所以,人类必须要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
- [2] 布罗代尔. 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M]. 北京:三联书店, 1993.
- [3]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1: 13-14.
- [4] 恩格斯. 反杜林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0.
- [5] 列宁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0.
- [6] 马克思. 资本论: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 497.
-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8.

[责任编辑:孙浩进]